

于培养研究型人才的，不似现在外语教学注重学生的交际能力(特别是口语)。联大没有开设现在通行的口语课和听力课。为了适应给美军输送“翻译官”的任务，昆明曾开办过译员训练班，外文系也曾派出教师，外文系的学生也有应征的。但是，学生的听力和口语都得到相当的训练。这是因为，外文系教师的课，不论哪一门，一律用外语直接讲授。别的系的教师(包括工学院)，也有一些教授是用外语直接讲授的，至少也会在讲授中夹杂许多外语。联大教授中90%以上留学欧美，他们的外语口语语音纯正，给学生作了很好的示范。至于我自己，还曾经选修了袁家骅教授的“语音学”，从中懂得了英语发音的科学方法，受到了发音规范的训练，因此终生得益。袁先生在解放后专门从事我

国西南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，曾帮助确定了壮族的标准语，创立了壮族文字。

西南联大把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的传统会聚于一身，形成了科学、民主、学术自由的学风，并继承了“五四”以来知识分子以国家、民族为重的思想政治传统，成为培养科学、学术精英的基地和反独裁、争取进步的“民主堡垒”。它在传授优秀中国文化的同时，也传授了优秀的西方文化。我在西南联大，不仅接受了它传输的知识，而且受到了政治思想的熏陶，积极参加了“一二·一”学生运动和学生社团的活动。

我深切地体会到了名校、名师对人的熏陶教育的力量。西南联大，我多么地怀念您，感谢您！

我的奋斗人生

○曾恭武（1944入学，中文）

我是云南省华坪县新庄乡人，自幼丧父，家庭贫苦，靠寡母煮酒喂猪抚育读书。而自幼读书十分勤奋，在家乡读小学，一直是名列前茅，小学毕业后，我不怕艰苦，敢于负笈走出大山，到丽江读初中，又到大理读高中，学习成绩进步很快。初高中毕业会考都名列第一。

1944年，我到昆明考大学，一连考取几所大学。在云南大学，我考取航空工程系，在西南联大，我考取文学院中文系。因我自幼喜爱文学，又仰慕联大名师荟萃，便舍工习文，进联大中文系读书。受业于朱自清、闻一多、沈从文、李广田、游国恩等文学大

师门下，经他们朝夕教诲，深受教益。特别是联大继承了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五四运动“民主、自由”传统，又正值抗日战争国难当头时期，师生都很关心政治时事，成了有名的“民主堡垒”，使我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。

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，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建国，而国民党反动派却一手撕毁“双十”协定，企图全面发动内战。震惊中外的“一二·一”惨案，使我亲身领受到了血的洗礼。不久又发生李公朴、闻一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惨案，我感到极大的愤慨。

1946年秋，联大复员回北平，我随校上

□ 联大春秋

北大继续完成学业，又参加了“反饥饿、反迫害”等爱国民主学生运动，使我进一步坚定了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，走革命斗争道路的决心。1948年9月，北大毕业后我回到昆明，便想到解放区找朱家璧（云南省革命武装主要领导人之一），参加革命武装斗争。因奔母丧暂回家乡，受聘到县中教书，次年任县中校长，积极传播革命思想。适逢华坪20年代早期入党的共产党员丁志平起义前夕，他前来和我联系，要我参加革命起义，我当即毅然应允。

后不久，丁志平在华坪县城举行了1949年“三·一六”革命武装起义，委任我为政治部主任。我草拟了《解放宣言》，并带领学生到街头宣传，还主持召开了群众大会、民选县长、开仓赈济饥民等工作，使县城秩序安定。后为了寻找党的直接领导，便主动奔赴滇西北，参加了朱家璧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边纵七支队三十五团，在政治处工作，时为1949年7月。12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三十五团期间，我亲身参与了攻打国民党保安团的兰坪“乐天场之战”，剑川“围城打援”之战，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，并写了战地通讯数篇向滇西北日报投稿。

1950年元月，七支队进军永胜、华坪，又在永胜谭家坪与永华地霸武装打了“谭家坪之战”。接着随军挺进华坪，并首先进入县城，参与筹备建立了华坪县人民政府，任第一届人民政府副县长，还代表县政府在华坪县政府成立的群众大会上讲了话。华坪政权建立以后，我带领工作队到大兴镇征粮。上山下乡，草鞋徒步，备尝艰苦。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，1950年7月底，正当征粮工作即将圆满完成之际，不知为什么突然被调回县城，接着于

次日与丁志平一道被送往丽江审查。后经大军四二师派人到华坪严格调查，查明我与丁案无关，又送我到昆明革大学习。

1951年3月结业回丽江，又派到剑川县工作，工作职务尚未确定，又因一平浪盐场公署解放前伪科长“曾光武”因欺压过工人，现经工人控诉指名要曾光武去批斗，他们竟把“曾光武”误认为是我“曾恭武”，一字之差就把我在剑川逮捕起来。后经我申诉查明有误，也不放我，接着便将我投入劳改，判刑15年，罪名是丁志平匪部政治部主任。就这样我被流放到鹤庆农场、维西锅厂、永胜米厘铜厂、丽江加工厂、昆明拖拉机厂等地劳改。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、大跃进时期，我在劳改队里忍饥挨饿，带铐拖镣，磨骨伤筋备尝艰苦，最后调到昆明拖拉机厂。1965年6月，我在昆明拖拉机厂刑满释放，不幸刚释放一天，恰逢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又被留队关禁起来，其间多次病危死而复生，但我始终规规矩矩服从改造，硬挺了过来，我终于活着走出了劳改队。

我入狱时年方29岁，而出狱时已年届61岁，虚度了黄金岁月。有人问我，是什么力量使我经受住了这样漫长而艰苦的考验？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：“我的精神支柱就是‘信念’，相信我自己绝对没有犯罪，相信政府总有一天会查清我的问题。”这一天终于到来了，1982年丽江中级人民法院对我的冤案给予平反，恢复了党籍和公职，工龄从参加革命之日算起。从此我获得了新生。

出狱后，我先被中华职教社云南职教分社聘请，到昆明关上教那些汽车兵团官兵的语文，深得他们的爱戴，接着又回到职教

社本部工作。我在职教社任教期间，蒙老共产党员饶博生社长（省政协副主席）对我的关心，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省政协和他在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，并把我的离休关系转到职教社。我心情舒畅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力量。然而这时，华坪县党政领导派人到昆明聘我回去支援华坪教育，我心系桑梓，不忍辜负家乡父老的厚望，便什么也不计较，毅然放弃在昆明的户口、工作、离休关系等优厚条件，举家转回了华坪，在杨柳湾教师进修学校教书，除教书外还组建学校党支部，任第一届党支部书记，并被县里选任为县政协副主席。在任职期间，我教书育人，并提出了教育结构改革的建议，曾被评为先进教师、先进党支部和先进政协委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一年在学校缺乏英语教师的困难情况下，我以年近古稀之人，自告奋勇承担了两个班的英语课，早晚都与学生打成一片，有一学生取得了华坪英语统测考试第一名。

然而，正当我全心全意扑在教学工作上的时候，我老伴忽得中风瘫痪，家庭处于危难关头，而教育局却无缘无故趁人之危，突然袭击，解聘了我的教师职务，停发了补贴，使我一家贫病交加。后来，我只好贷款在仙人洞修了几间平房，搬出了学校。在仙人洞，我为了维持基本生活，并给老伴医病，只好答应县志办帮忙修改县志，一百多万字的县志都是经我一手修改过的，从中得到了点微薄收入，以补贴家用。

虽然家庭十分困难清苦，但我仍不忘吟诗作对，自得其乐。我加入了省诗词、楹联学会，并经常投稿。1997年，我到省城开会，看到云南全省各地都成立了学会，而华坪却是一片空白，回来后便写报告到县委要

求在华坪成立诗词楹联学会。经县委批准后，学会正式成立，我任常务副会长，实际主持学会工作，次年正式任会长，积极谋求学会发展。鉴于会员们缺乏写作传统诗词的知识和技能，我不辞辛苦亲自开知识讲座，并编写《诗词楹联基础知识》一书，让大家学习写作。我还主编《朝华诗联》会刊，面向当前政治时事开展各种活动，使学会办得有声有色。学会出了《朝华诗联选》，而我自己，除了以前编写的《诗词楹联基础知识》以外，又出版了《奋斗人生》、《未已集》、《曾恭武诗词楹联选》、《曾恭武奋斗人生之果》等书。我的作品被编入许多国家级典藏。现在我是华坪诗词楹联学会名誉会长，中华诗词学会、中国楹联学会会员，中华对联文化研究院研究员。

我虽年过九旬，仍笔耕不息，奋斗不止。我在最近出版的《曾恭武诗词楹联选》一书自序中写了一副对联：

读书救国，投笔从戎，受屈蒙冤，九死无悔；

执教献身，兴诗立会，呕心沥血，一生高歌。

这概括了我的一生经历和思想感情。欣逢国庆六十周年时，我又填了一阕《满江红·歌颂祖国六十周年华诞》的词，以表庆贺之忱：

甲子一轮，覆地翻天，岁月峥嵘。忆百年历史，丧权辱国；九州禹甸，长夜难明。官比豺狼，吏如鹰犬，欲与阎罗赛杀生。共产党，铁肩担道义，再造乾坤。

江山是处皆春，令环宇人民括目钦。看归宗玉璧，扬吾神武；夺奥金奖，振我民魂。奔月嫦娥，凌云浩气，阙破官开玉帝惊。喜今日，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！